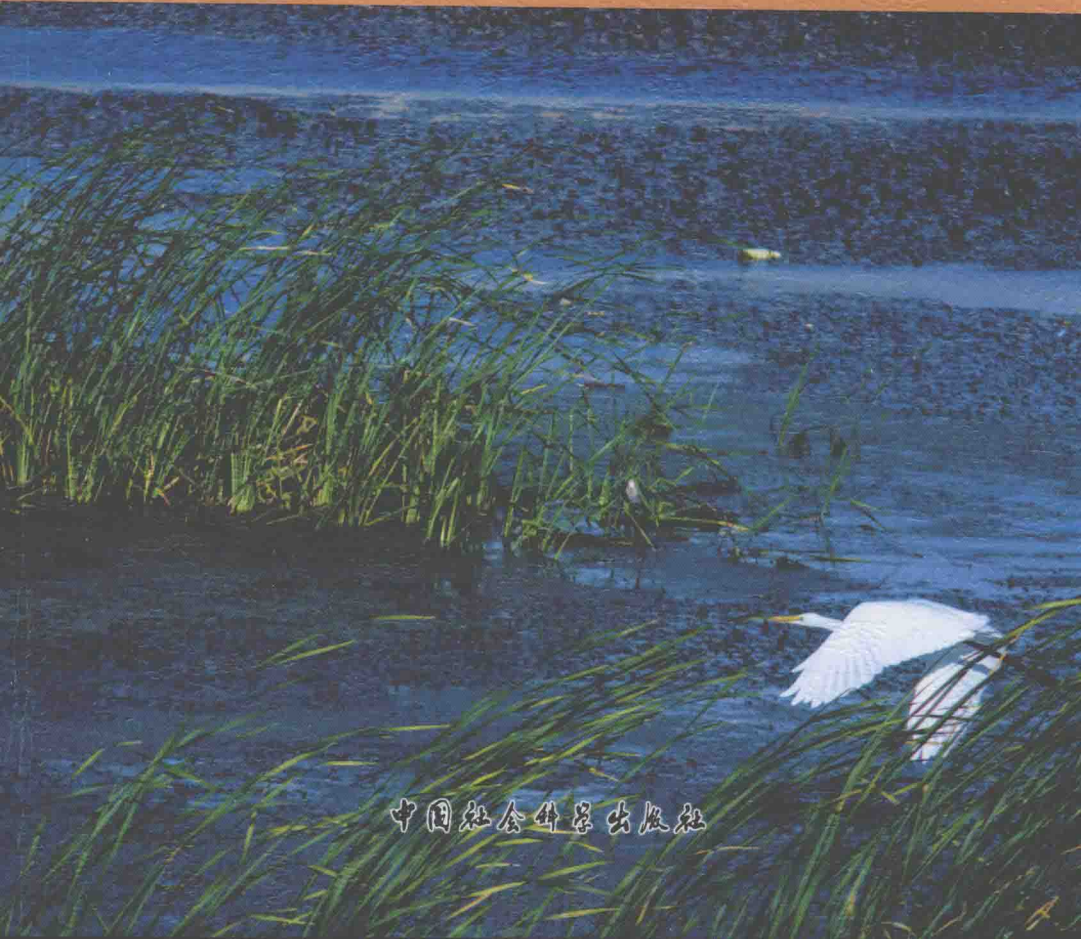
生态文学批评译丛
李贵苍 蒋林 主编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德] 阿尔弗雷德·霍农 赵白生 主编
蒋 林 聂咏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态文学批评译丛
李贵苍 蒋林 主编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德] 阿尔弗雷德·霍农 赵白生 主编
蒋 林 聂咏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5－74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德) 霍农，赵白生主编；蒋林，聂咏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生态文学批评译丛)
书名原文: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ISBN 978－7－5161－7721－1

Ⅰ.①生… Ⅱ.①霍…②赵…③蒋…④聂… Ⅲ.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Ⅳ.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129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 2013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Heidelberg

走向生态文学批评(总序)

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符合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逻辑和轨迹。纵观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一条清晰的脉络便呈现眼前，即文学作品的意义要么被认为是由作者所表达，要么被认为存在于作品本身，要么被认为是由读者所建构。围绕作者—作品—读者这三个基本要素建构意义的西方批评史，演变出了各种理论和流派。概而言之，对应以上三个基本要素的主要学说，就是“模仿说”、“文学本体论”（Literary Ontology）和“读者反应批评”。历史地看，三大学说的交替发展亦可以认为是文学批评不断语境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模仿说是以现实世界为语境，文学本体论是以文本为语境，读者反应批评则是以读者为语境建构文学作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既不研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也不研究作者的表现力问题，更不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事手法，而是将读者作为语境，研究读者的反应和接受，并由此开创了接受美学，这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对过往批评的反驳和颠覆性转型。这是因为以读者为语境的接受美学首先不承认文本的自足性存在。相反，该理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未定的，是等待读者凭自己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完善的多层图式结构。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自创作完成的，而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由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而成的，从而赋予文本以动态的本质。其次，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创造性的阅读过程以及接受的主体地位，必然认为阅读即批评而批评即解释，这无异于说，阅读是一种建构意义的行为。文本的开放性和藉由读者建构意义，赋予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使得文本意义失去了其唯一性。

那么，读者何以能够建构意义呢？按照姚斯的理解，那是因为读者有“期待视域”（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即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所形成的艺术经验、审美心理、文学素养等因素构成的审美期待或者先在的心理结构，读者的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基本态度、意义生成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显然，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可能一致，其对待文本的态度和评价标准会因人而异，故，生成的意义也会超出任何个人的建构。可以说，读者作为语境因其视角的变化而将“意义”主观化了，这也符合接受美学所倡导的阅读“具体化”，即主观化的主张。从哲学本源上讲，接受美学受现象学美学影响，在主观化和客观化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

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意义上的读者是不存在的。任何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读者，都有各自形成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社会意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根本看法和主张，这必然导致读者的阅读视野的构成要素互不相同。读者阅读视野的不同必然导致读者作为语境的个体差异。比如说，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坚信人类大同的读者、一个坚信性别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种族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读者、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一个文化沙文主义者、一个坚信强权就是正义的读者、一个因人类为了自身发展而对环境破坏感到痛心疾首的读者等，均可能以自己愿意相信的观念、事实、话语、热点问题等为语境，解读并建构作品的意义。

接受美学的最大功绩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文本观念。换句话说，接受美学赋予文本开放性的同时，带来了读者围绕语境建构意义或者解释文本的无限自由。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文学批评界流派众多、学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这不能不归结于读者反应批评兴起后带来的变化。变化的动因无疑是读者的语境化解读促成了读者解释视角万马奔腾的壮丽和纷繁，这壮丽和纷繁还体现于批评方法、理论视角、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多样性。譬如说，我们可以依据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性别研究、修辞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分析等理论，研究文本对性别、种族、主体、他者、身体、权力等问题的书写和呈现方式。当以上问题的讨论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其他重要的社会或者全球问题必然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比如说，空间、环境和自然。

环境和自然作为批评语境既是文学批评语境化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自读者反应批评赋予文本开放性不断“具体化解读”文本的必然，同时也是人类重新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必然。环境和自然作为文学批评的语境，如同性别、阶级和种族作为语境一样，有着自己关注的重点，会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形成迥然不同的流派，如女性主义批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上百个流派一样。一如女性主义批评没有统一普遍接受的定义一样，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开放性的本质，虽然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也无定论。

尽管如此，各国学者还是能够从最宽泛的角度，大致接受生态批评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中的定义，即，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就是“以地球为本研究文学”（xviii）。这无异于公开挑战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不仅如此，“以地球为本”的生态批评对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也提出了严厉批判，因为，用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

在《践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的话说，后现代理论“指向的是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和“自我条件反射的自恋癖”（53）。“自恋”指的是对文本和结构的一味热衷。

同为生态批评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在其生态批评专著《文学、自然和他者》中精辟地指出：“多元人本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原来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鼓励个性成长和学术多元化的努力，现在则滋生了一种放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人们不愿做价值判断或者干脆采取意义‘不确定’的立场，常常导致对文化价值的争论浅尝辄止”（3）。墨菲虽然没有勾画出多元人本主义在美国完成了其使命后文艺理论可能发展的前景，也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学者们采取“不确定”立场的思想根源，而是对学术界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回避做出文化价值判断的相对论态度提出批评，他于是呼吁学术界寻找新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探讨。这一呼吁同时也期待学术界要承担起新的“使命”，以保持批评对原则和正义的坚持。其专著的书名表明他找到的新的“问题”就是重新认识并确立人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确切地说，他找到的研究问题就是文学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文学评论家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就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与自然的长期对话关系。从理论角度思考，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是英美学术界在寻求理论突破时的必然。

如果说，文学的创作和消费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活动和过程，必然反映着作者和读者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心态，那么，在人类住居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必然反映着作者和读者的生态观念，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思潮的发展。作家和批评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折射并回应社会思潮发展脉动的结果，就是欧美包括日本文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在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最近几十年间，环境保护意识在英美不

断增强，并不断向社会各阶层扩展。用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绿色声音》中的话说："1988 年春季，撒切尔夫人走向了绿色，1991 年夏天，国防部走向了绿色。到 1992 年，连女王也走向了绿色。"（2）于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政策推动，英美学术界终于找回了"自然"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主题，从一个新的视角发展多元人本主义，并结合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开创了生态批评这个全新的批评流派。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生态批评是后人本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后现代主义寻求突破的必然。今天，它的队伍不断壮大，其发展高歌猛进，引起了不同学科的重视。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学等等概念的探讨和争论持续而激烈。这种现象的出现，用生态哲学家麦茜特的话说，是因为"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科学"。就文学批评而言，凯特·里格比做了这样的判断："生态批评目前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实践。"（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194）

英美的生态批评滥觞于 20 世纪的 70 年代，但其具有学科意义的发展却是在 1992 年美国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之后。如今有 1300 多名美国国内外学者入会，其中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均成立了分会。次年，该协会开始发行自己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生态文学批评经过 20 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国外出版的专著达几十种，研究范围涵盖了几乎所有文类和重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等。

我国社会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但全民的"绿色意识形态"并未形成，因为阳光一旦照射大地和城市，阴霾天气似乎就是往昔和未来的事情了，呼吸清新空气的需求很快让位于生计大事了。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教育严重滞后：人与环境和自然关系的课程尚未被纳入普通的大学教育之中。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恶化程度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程度。2013 年 3 月 26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一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有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27 万条，20 年前是 5 万多条，这表明在短短的 20 年间，我国在地图上消失了 2.8 万条河流，其流域面积相当于整个密西西比河的流域面积。官方的权威解释是过去测绘技术不高，导致河流数字估算不准确，而直接原因是干旱和气候变暖等。一句话，全是人力不可企及的技术和自然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以为，人的因素可能才是主要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还将持续下去，这必然会带来环境文学创作呈增长的趋势，这不仅有利于文学创作的道义追求，也能深化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繁荣的文学创作必将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甚至会促使我们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不仅要问人类需要怎样在地球上生活，而且要问人类应该如何与地球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决定翻译生态文学批评丛书的初衷，希望引起作家、批评家和社会大众重视环境问题，审视我们的环境道德观念，进而破除以人为本的批评局限，以期树立以地球为本的负责任的新的世界观，并以此重新解读文学文本的意义。

世纪之交之时，我在美国读博士，导师是现任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主任帕特里克·墨菲教授，他是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后兼任过《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刊物的主编。他曾暗示我写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博士论文，但由于我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文学中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一直没有为他主编和撰写的关于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有过丝毫贡献。2009 年，他应邀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学，并来我校做了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讲座。我们讨论了翻译一套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丛书事宜，他热情很高，回国后很快寄来十多本

专著和论文集，并委托他的日本朋友挑选了两本日语专著。书籍收到后，适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社长来我校讲学，我们谈起这套丛书，赵先生认同我们的想法，并表示愿意购买版权并委托我们翻译。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际学院的师生承担了5本书的翻译任务，另一本由大连海洋大学的教师翻译，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对他们的努力是需要特别感谢的。我校社科处、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和人文学院，对这套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浙江师范大学

李贵苍

2013年5月8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译者序

自2010年由浙江师范大学李贵苍教授和我共同启动“生态文学批评译丛”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迄今已出版3部译著。这本由德国约翰尼斯·古腾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教授和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合编的题为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中文译名为《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论文集，历时两年的翻译，其中文版即将付梓于世。在此之际，我愿意简单回顾一下其中的来龙去脉。

2013年7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短暂停留。期间参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位朋友组织的聚会，初逢霍农夫妇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敬珏（Cheung King-Kok）教授，从而得以相识。同年9月，我给霍农教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是否可以汉译2013年由海德堡冬季大学出版社（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Heidelberg）出版的 *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一书。霍农十分热情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积极联系该书的另一位主编赵白生教授和德国出版社，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便确定好版权授权等事宜，同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免费使用该书的中文版权。霍农不仅亲自出面帮助我解决了版权问题，而且还数次来函告知书中的一些笔误。能遇到如此严谨、热心之人，作为译者的我实属幸运。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共收录24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最

初是2010年在德国美因兹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生态文化组织（World Ecoculture Organization）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当前关注全球生物圈的未来及人文地位的生态行动主义的一部分。全书分为“生态与文学”“自然与文明”“树木与动物”和“环境与伦理”四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来自德国的有11人之多，如霍农、马克·伯宁格（Mark Berninger）、比尔吉特·卡佩勒（Birgit Capelle）、凯特琳·格尔斯多夫（Catrin Gersdorf）、萨拜恩·金（Sabine Kim）、卡特娅·库尔兹（Katja Kurz）、蒂姆·兰岑德菲尔（Tim Lanzendorfer）、萨拜恩·N. 迈耶（Sabine N. Meyer）、埃里克·雷德林（Erik Redling）、曼弗雷德·斯博德（Manfred Siebald）和胡伯特·扎普夫（Hubert Zarf）；美国学者有吉尼·贾伊莫（Genie Giaimo）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英国学者有葛雷格·加勒德（Greg Garrard）、阿克塞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另有澳大利亚的凯·谢菲（Kay Schaffer），土耳其的比尔格·马特卢埃·塞丁特斯（Bilge Mutluay Cetintas）和塞尔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韩国的西蒙·C. 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瑞士的德博拉·L. 玛德森（Deborah L. Madsen）和印度的尼玛尔·塞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中国有杨金才、许德金和陈广琛三位学者撰文。

霍农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基于自然写作与生命写作的对等性，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自传体关系成为生态全球主义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合作的沃土。在美国西南部及太平洋地区，生命写作的践行者们赋予自我新的表现方式，把自然循环和环境健康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些作家把北美土著人与原住民的生命写作项目，以及亚裔北美人反映亚洲崇拜自然的传统思想的自传体作品联系起来。这种关于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相互关系的跨文化、跨国界的观点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文集中的24篇论文着重探讨了生态文学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地区个人写作

方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涵盖了美国自然写作的传统与亚洲人民对自然的崇拜，同时还诠释了自传/传记文本与电影的关系以弥合东西方话语之间的差异，并为生态批评与生命写作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新的方法，是当前生命写作领域的最新成果。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一书的翻译可谓是集体之作，参与人员主要有我的同事聂咏华、蔡晓斌、李艳和我的学生陈红慧、沈凯麒、徐茜茜、周佳丽、郭婷婷、许心仪等。尽管其中部分参与者仅迻译了单篇文章，且翻译问题甚多，但我的感激之情依旧。学生参译者之所以众多，是源于我一直坚持的把翻译项目带进课堂的教学理念使然，翻译专业学生的培养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锻炼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提高其翻译技能。统筹、组织、审校、修改、润色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些工作让人身心疲惫，耗费精力，相信亲历者能体会个中滋味。幸得聂咏华老师的鼎力相助，帮我分担了部分工作，使这本译著能够按时出版。另外，我也要感谢已经毕业的两位研究生金骆彬和赵粟锋，他们在校期间协助我组织翻译研讨、协调分工等事宜。当然，我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赵剑英社长、夏侠女士和慈明亮先生。赵剑英社长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生态文学批评译丛”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夏侠女士作为该社的国际合作与出版部的负责人，为本书的版权转让和协调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而慈明亮先生则为译著的编辑、审校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过硬的专业素质、较高的编辑水平和低调务实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翻译《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过程中，我制定了统一的翻译原则，坚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英文原著在语言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专业词汇、名词化、被动句和复合句的大量使用。由于学术著作旨在传递科学信息和学术思想，其科学性和学术性要求译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因此，学术著作的翻译应以忠实为最高标准。当然，在保持忠实

标准的基础上，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同时也为了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我们还必须追求译文的可读性。我认为，直译可以有效地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而在直译的译文与可读性相冲突的情况下，则采用意译辅助，从而可以确保译文容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此外，考虑到原著采用的是严谨的学术文体，我们汉译时在遣词造句方面也尽量彰显与原著相一致的写作风格。

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可以活跃学术、交流思想，还可以推动文化创新、促进人类文明。生态批评是对人类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所进行的反思和自省。我国的生态批评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投身于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结合本土文学特色，将中国老庄哲学中的生态资源以及西方与文学的生态资源进行对比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在生命写作方面却鲜有论及，但就生态批评经历的两次发展浪潮而言，第一次浪潮便与生命写作有关，强调对自然保护的强烈责任和对英美自然写作、自然诗歌的关注。因此，如何从生态文化多元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作家和作品，探寻生命写作的价值，这便是我们致力于翻译《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目的之所在。尽管这项翻译工作用时过长，而获利甚微，但其带来的精神愉悦却让人乐此不疲，慰情聊胜于无。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误译之处自是难免，敬请诸位不吝指正。

是为序。

蒋林

2015年5月6日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序

阿尔弗雷德·霍农

尽管20世纪60年代文化重新转向以来，公众的生态问题意识日益增强；虽然政治活动家们也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生态运动只是由局部缓慢地演变成一场全球性行动。对于一个更为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日常存在来说，“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的口号仍然是一条可行的准则，但它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提及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新闻记者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启示录《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1989）里阐述的那样，气候变化同样会对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人类产生影响。

生态话语发轫于20世纪初，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生态话语起初关注到核能带来的危险及与政治、社会及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研究这一领域的紧迫性，提出了“人文绿化”（greening of the humanities）运动［帕里尼（Parini）］，拓展了生态批评领域，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并创办了《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杂志。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依赖于生态运动的各种努力以及美国文学中丰富的自然写作和卓越的当代生态批评作家。生态批评方法本身不仅可用来讨论美国西南部地区和后殖民写作的新形式［爱德华·阿比

(Edward Abbey)，罗道夫·阿娜亚（Rodolfo Anaya)，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而且也可用来重新评估美国浪漫主义。自然与自我关系的自传体维度以及性别含义不仅催生了生态传记和生态女性主义［引自戴蒙德（Diamond)/奥伦斯坦(Orenstein)］等新的体裁，同时也产生了从“生命科学”的视角来研究生命写作的新兴医疗人文学科［达马吉欧(Damasio)］。美国境外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也承继美国同行的生态批评实践，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拓展谢丽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生态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xviii）这一相当宽泛的定义，英国批评家葛雷格·加勒德（Greg Garrard）将生态批评主义理论化，而研究美国的德国学者胡伯特·扎普夫（Hubert Zapf）则把文学概念发展为文化生态学。扎普夫认为，文学作为对现实的审美转换，具有一种对文化—自然范式进行象征性表达的特殊潜能(2002，2008)。自传体的语用基础依赖于经验自我和文本自我的相关性，为考察文化—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自然写作等同于生命写作，而生命写作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术语涵盖了一切形式的自传实践［引自史密斯（Smith)/沃森(Watson)］。因此，把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自传作品视作环境写作的一种理论联系的新起点也就不足为奇。《瓦尔登湖；或林中日月》（*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经典地诠释了梭罗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体验，这不仅激发了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环境的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思想的产生，而且使这位批评家将浪漫主义意象延伸至跨国的框架（transnational frame）里（比尔，1995)。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环境写作经典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关注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的环境变化，而且也关注全球性的生态与文化的关联性。实际上，《瓦尔登湖》既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